

屯堡族群与族群认同

——以天龙屯堡为例

朱志燕

[摘要] “屯堡人”是政府、学者、媒体和地方精英共同建构的族群共同体,是以普同性的“屯堡文化”为标准做出的人群的类型性划分。而在“屯堡”族群内部,由其人员构成成分多元性带来了族群认同的多元性。现有的屯堡研究范式无疑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上把握该族群活动的时空大背景,但对屯堡族群群体性差异的研究则更生动地反映了族群活动的历史,为了解人群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资料。

[关键词] 屯堡族群;族裔实体;族群认同;历史记忆;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02-0032-05

Tunpu Ethnic Community and Ethnic Identity

——Taking the Tunpu People in Tianlong Village for Example

ZHU Zhi-y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unpu people” are an ethnic community jointly built by the government, scholars, the media and the local elites and a typological division by their shared “Tunpu culture”. Nevertheless, the diverse membership inside the community gives rise to the diversity of ethnic identity. The present research paradigm for Tunpu people is doubtlessly helpful to understanding the space-time macro-background of the ethnic community; however, researches into their differences can more vividly reflect their activities in history and give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culture.

Key Words: Tunpu ethnic community; ethnic entity; ethnic identity; historical memory; diversity

一、问题的提出

元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在贵州学界曾经一度出现“屯堡文化研究热”,产生了众多屯堡研究的作品,但对屯堡人认同的研究尚不多见,故本文试图以天龙屯堡为例对屯堡人的族群认同作一考察。

(一)“屯堡人”何指

地域上的“屯堡”是指处于贵阳至安顺距离一百余公里的大片平地内包括的三百多个屯堡村寨。这些村寨多以带有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关、哨、卡、卫、所等命名,其中又以屯、堡命名者为多。^[1]

学界将“屯堡人”界定为:“清代载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今在贵州省平坝、安顺、镇宁、普定、长顺等

县市内明屯军后裔的专称。屯堡人口现约三十余万。其特点是他们的入黔祖先大都原籍江南,尽管历经数百年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他们大多数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区内,并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这在汉族各支派中是十分罕见的。”^[2]

目前可见的史载之“屯堡人”称谓最早于民国年间。民国《平坝县志》:“名曰屯堡者,屯军驻地之地名也”,“迨屯制即废,不复能再以军字呼此种人,唯其住居地名未改,于是遂以住居名而名之为屯堡人。”另外,“屯堡人”还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安平县志》卷五称之为“屯堡”;《安顺府志·风俗》称其为“屯军堡子”;《镇宁县志·风俗》称之为“凤头籍”;《黔南职方纪略》卷一名之为“屯田子”、“凤头鸡”;

《平坝县志》呼为“凤阳头笄”；《贵州通志·土民志》则有“凤头苗”之名。汉族民间也有称之为“堡子”、“大脚”者。^[3]

关于屯堡人的族源：学界倾向性意见认为，屯堡人是明代江南一带在贵州屯军的后裔，是来自凤阳、南京等地的汉族；其二认为，屯堡人的主体来源是北方少数民族，屯堡人的信仰、食品、地戏、服饰等方面均由此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4]

屯堡文化研究和屯堡族源研究紧密结合，互为补充，以突出其独特性为目的。强调的是住堡子、说堡语、穿明式服装、勤耕读、善工商、崇祖宗、拜汪公、敬五显坛、男人跳神、女不缠足^[5]式的与西南少数民族不同的明代江南地区文化传统。其中以对屯堡“地戏”的研究最为集中，如《安顺地戏论文集》。^[6]通过研究地戏这一民间的“跳神”仪式追溯屯堡人的源流，最多的分析则是地戏与构想的族源历史之间的关系，^[7]从而强调屯堡文化的特殊性。

（二）屯堡研究引发的理论思考

各家尽管在族源问题上的具体观点不同，但秉持的研究范式却相当一致，即对屯堡人文化渊源的历史追溯成为主要学术研究取向，这一取向与中国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旨趣是相一致的。然而这一“自上而下”的关怀易于陷入一个所谓“客观”的误区：把对由不同时空中抽取出的文化因素的整合等同于“民族”或“族群”的普同性，把族源的考证等同于“同质文化”的历史，进而等同于“民族”或“族群”的历史。屯堡研究即以屯堡文化的建构和族源的追寻为基础，进而划定屯堡的界线，勾勒其形成、发展、演变及相应的族际关系的历史过程。

实际上，文化的维度在西方的族群研究中也都有其倡导者，20世纪60年代Naroll对文化与人群的关系作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总结，他主张“族裔实体”(ethnic entity)即为“文化的承载单位”(culture-bearing unit)，强调以文化特质的分布、政治组织、语言、生态适应及地方社区的结构等要素作为界定族裔实体的一般标准。换言之，一个族裔实体应具有同一地域、拥有相同的生活形式、同属一政体、操同一语言、对环境有一致的调适模式且同为生活空间结构的一环，总之他们享有共同的且别于他者的文化，包括外显的习俗、政治文化、语言文化、生态文化及社区生活。Naroll所建构的“文化——文化的承载单位——族裔实体”的一一对应关系，随着人类学日益精致化的田野作业和“深度民族志”的强调而被认为难以找到事实的例证与根据。而另外一些早期的“族群理论”者，如Edmund Leach就已经开始主张族群的认定不应用客观的文化特质为标准。因为诸如语言、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甚至身体特征

都是易于变换的，不足以作为族群认定的标准，只有自我认同的意识才是族群存在的真正准则。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 Barth)认为，文化差异与其说是族群的定义特征，倒不如说是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维持的一种“牵涉”或结果。因为既然族群产生于不同类别人群之间的互动，那么建立在出身、背景之基础上的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定(self-ascription)与被他者认定(ascription by others)则成为互动得以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族群并非是文化承载与区分单位，而是互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或组织。^[8]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所以说，在族群互动中，族群认同与族群界限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文化差异则成为可操控的族群外在表征，因此其不过是族群认同与族群界限维持的一种牵涉或结果。巴斯的看法开启了族群研究的新里程碑。他的观点揭示出客观特征论的不足，认为其最多只能表现族群的一般性内涵，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而无法探讨族群边界问题，就无法探讨族群认同变迁和族群关系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理论关怀，笔者对平坝县的天龙镇进行了考察，试图以族群边界理论为观照，从屯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出发，结合屯堡人的历史记忆，以“主位”自述(self-narrative)的角度探究“屯堡人”之名所蕴涵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族群认同所表达的族群关系；同时，对部分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以期对屯堡族群和族群认同有更全面细致的认识。

二、从天龙屯堡的个案谈起

天龙镇位于贵州省西部平坝县，在喀斯特地貌的大山深处，有天台山、龙眼山两山脉，距贵阳市72公里。这里地处西进云南的咽喉之地，在元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名“饭笼驿”，后更名为“饭笼铺”。20世纪初，天龙的几位有名乡儒认为“饭笼铺”的“饭笼”二字不雅，经提议，取天台山的“天”，龙眼山的“龙”二字为村寨之名，这就是天龙镇“天龙”二字的由来。目前，天龙镇以“屯堡文化”为资源正在着力发展旅游业。

据《天龙陈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73年)湘、滇、黔三省基本平定，为了防止土司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确保湘、滇、黔三省中路通畅无阻，乃于位居滇之喉，黔之腹的普定卫(清代改称安顺府)与安平卫之间大量屯兵……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公文交接及军情传递的机构。按明制：每六十里设驿站(亦称塘房)一所以应沟通。鉴于安平与安顺之间相距百里，当设塘房两处，供信息传递和过往官员食宿之

所,乃于今天龙镇及安顺二铺设驿站两个,天龙驿站名曰‘饭笼驿’(后改称饭笼铺)。”

访谈中,天龙村的村民不断强调“我们是‘征南’来的,是‘老汉人’,和‘填南’的是不一样的”。而对于现在习惯上称呼的“屯堡人”,老者们认为:“云南平定之后,由沐英带领的一万多人就在贵州垦荒戍边,但是当时贵州一带土司很多,屯军的人受到歧视,于是朱元璋又动员江淮一带二十多万人到了贵州,这些人就是‘填南’来的。这些人里商人、小手工人多,农民不多,所以这些‘填南’来的都是缠脚的,和‘征南’的不一样,‘征南’的都是‘大脚板’。他们来了以后都是挨着屯军住,借屯军保护他们。他们开荒种的庄稼一部分支援屯军,一部分自用,还有的替屯军传送公文、来往函件,接送大小官员,为屯军服务。所以‘填南’来的这些人就和屯军是邻居,这些人住的地方就叫‘堡’,军队住的地方就叫‘屯’,这样‘屯’和‘堡’的关系很密切,后来人们就叫‘屯堡’了。外面的人不清楚屯和堡之间的关系,就认为屯堡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自己的人就知道哪些人是‘征南’的‘屯’的,哪些人是‘填南’的‘堡’的。现在有些被外面看成是‘屯堡’的村寨,我们就不认为是屯堡的,他们都是后来的,这些只有我们自己是分得清的。”

对屯堡的发展,老人们说:“原来天龙屯这个地方是苗寨,屯军到来了,所谓大军压境,中央军来了,周围的苗人住着生活就很不习惯,有些就转走了,有些同化了。到康熙二十六年(1675年),王朝看到屯军一代一代的势力太大,就下令取消屯军,改卫设县,屯军改为庶民。这样子人们可以自由走动了,有些人就走了,有些就留在此地开荒拓业。后来,留下来的这些屯军的老家的亲戚朋友有的就投奔此地。江淮一带人多地少,贵州地广人稀,因此来贵州的越来越多,屯堡人也越来越多了。但这些人不是集体一起来的,也不是官府安排的,他们都是自行来的。来了之后就挨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居住下来了。”

提及屯堡人的婚姻问题,老者们说:“屯军来的可以带着家眷,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成家的啊。这个问题朱元璋也看到了,所以他后来就调来了民屯,就可以解决那些没有成家的屯军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屯堡有句话叫‘宁愿男大女十年,不愿女大男一载’,就是说以前屯军的时候,好多男的都是很大了才等到合适的女的成家的。我们天龙村来的时候是张、陈、沈、郑四位老祖公,这四姓因为结成兄弟了,四代之内就不准结婚,四代以后就可以了。开亲的都是汉族找汉族,屯军的找屯军的。凡是屯军来的都是汉族。因为参军的都是农民多,(其实)就是农民找农民。开始也不和后来的‘填南’的开亲。‘填

南’的是商人多,他们是缠脚的,穿短衣服、短袖子的,因为他们商人是拿秤杆子的,(穿)大袖子不方便;还有些书香门第的、富有之家的小姐是穿旗袍的。他们都和我们农民不一样。我们农民是屯军的,种田的,是冬天穿大袖长袍子,夏天穿短的(衣服)。我们屯军的结婚就不愿意和商人、书香门第的读书人结。他们不种田、不开荒,有钱,有文化。他们把农民也看低,也不愿意和农民结婚。但到了后来,文化一样了,就有开亲的了。也有找苗(族)的,但不太多。主要是取消屯军以后,寨子周围都是苗(人),大家一起生活,就有开亲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天龙村一直都不和被外界统称是“屯堡人”的附近的大西桥镇石板房村通婚。而后者距离天龙村只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对此,天龙村人解释:“因为以前天龙村有一个姑娘,也就是我们的姑姑嫁到石板房之后死在了那里,天龙村人不愿意,一起去石板房讨说法,没想到石板房人不讲道理,结果两个村庄打了一架,从此各自发誓不再互相嫁娶。同时,石板房也坚决不和天龙的人联姻,只是石板房的说法和我们天龙不一样。”

三、屯堡人员构成的多元性和族群认同的多元性

从天龙屯堡的个案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屯堡”以及所谓的“屯堡人”是自明朝初年开始的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有长期、复杂的创建、发展和嬗变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而,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造成了屯堡人员构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实行卫所军户世袭制和军屯制只是“屯堡”的肇始,屯堡是由卫所制派生出来的。而卫所制经历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开始衰败,屯田制也伴随卫所制的衰败而衰败,到明朝后期屯军的身份已经发生改变。但是屯军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它的存在虽短,却为贵州的政治社会结构嵌入了一种新的机制,从而引发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即贵州汉人移民社会的建构。而“屯堡”以及“屯堡人”正是移民社会建构的结果。

从屯堡的人员构成上看,明朝军士及其家属是屯堡人的最早来源,但并不是唯一和主要的来源。“屯堡”成员中既有明初“征南”屯军的军人及其家属成分,更汇集了此后数目众多的“填南”人员和以各种方式,如投亲靠友、缔结婚姻、流放犯人等进入屯堡地域的其他移民成分,同时,还有“汉化”的土著民族。实际上,明代中期以降,屯军制度逐渐衰退。据记载,到明景泰四年(1453年),“贵州卫所、站(驿

站)、堡、旗甲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天龙镇所在的平坝县也是如此,“天启年间(1621~1627年)以后,继续连年兵乱,屯军百人难存一人。”到了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坝县仅残存军户184户,235丁。所以,明代屯军后裔虽然是屯堡人构成的重要部分,但就人口数量而言,并不是屯堡人的主体。

而众多屯堡村寨的形成虽开始于明代,但发展和壮大却是在清代,更有些屯堡村寨是在清代以后才形成的。如安顺市七眼桥镇的本寨形成于清中期,以金、杨、王三姓为主,这三姓都是以土地买卖的方式迁入屯堡的本寨;再如从目前安顺市最大的屯堡村寨七眼桥镇九溪村来看:九溪的建立最早大约是在明初“征南”战事结束之后,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九溪屯堡人员的构成不仅保留了军士成分,如九溪的张姓、宋姓、汪姓等,也有因其他原因迁入的王姓、黎姓、袁姓、翟姓、何姓等,他们的始祖是明初所谓“调北”和“填南”时迁入,而村里的刘姓、徐姓则是在清代嘉庆年间以经商方式迁入九溪的。^[9]天龙村也是这样:在天龙虽然是四大姓(张姓、陈姓、沈姓、郑姓)开基建寨,到现在村寨仍然以郑、陈两姓居多,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天龙村已经有了十二三个姓氏。调查中笔者粗略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天龙村居民是从贵州其他地区搬迁至此的。

另外,据日本学者塚田诚之的研究:屯堡中的(“屯”上“土”下)与“屯”是有区别的。前者实际上是清末以来各个民族族群的人们为了避免战祸与掠夺,在周边村落临时聚集的地方,而且村落的城墙也属于清代所建。虽然在那里的居民穿着服饰与屯堡人完全相同,但也不能将两者相混淆。^[10]笔者经天龙镇顺及参观的属于“屯堡”的云山就属于此类,实际上云山的村民之中苗族不在少数。

其次,各种不同的移民成分和人员类别在“屯堡”相连成片的特定地域内长期互动磨合,同样的生存境遇和生活发展需要,使共同地域内的成员形成了地域性的人群共同实体。这个共同实体即外界称之为的“屯堡人”。

在与周边其他民族互动形成的生存资源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在中华帝国“华夷之辩”主控叙事语境之下,共同的中心到边陲/边缘的生活经历和移民历史记忆,同为离乡客的移民心理,形成了“大老乡”式的地域性人群单位。通过各种途径在不同时间来到该地的安徽、江苏、江西、河南、湖北等地,也许是各种民族族群的人们在移入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对固定的生活圈内长期互动,共同整合塑造了所谓的“屯堡文化”。它属于新的移民社会所有,为地域性人群共同体所共享,并以此为“符号”和“资

源”,成为所谓“屯堡人”与其他民族族群,特别是贵州土著民族相互区隔的标志。就此,所谓“屯堡”族群的地域性认同和族群社会关系格局建立起来。

其三,虽然地域性人群共同实体,即所谓“屯堡人”是该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族群的边界,但在这一人群内部,“亚”族群成分依然各自认同,显示了“屯堡”族群认同的多元性。

在建构的“屯堡”族群整体认同(totality identity)之下,群体成员在同一地域空间内互相交融整合采用了灵活的策略,这样由资源利益分配竞争和群体关系等带来了次群体性(particularity)的“自述”认同。

由于在明清数百年时间之内,“屯堡”族群人员的构成成分是多元的,“屯堡”地域性实体的形成过程也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在“屯堡人”的内部,“屯堡的都是汉族”这类“一般性”表述已经失去了区隔(包容/排斥)的价值和意义。此时“征南”、“屯军”、“老汉人”和“南京人”式的历史记忆被一遍遍叙说着,借以在所谓“屯堡人”内部建立起新的群体边界,确立“屯堡”地域性认同之下的次族群的自述认同。历史记忆中的“军屯”身份以及世代相传的“征南”而来,在自述认同中成为合理化、合法性的族性自我认同的源生性纽带。征服者、开拓者、正统性的优越感随之穿越时空绵延至今。“征南”者不但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其他汉族,包括“填南”者。历史记忆中的“老汉人”是大明王朝开疆拓土的功臣;是土著民族的征服者、占领者;是贵州汉人社会的先驱和开拓者。

一方面,他们歧视当地少数民族,在天龙村中老年人的口中常能听到“当年我们的老祖宗是坐轿子的,而那些苗人的祖宗都是抬轿子的,抬轿子的当然只能穿短衣服,方便,我们坐轿子的就穿长袍子”样式的族群关系表述;另一方面,由族源叙事衍生的正宗、正统心态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对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后迁汉人的商屯移民,亦持排斥原则,将之拒斥于“老汉人”次群体的边界之外。在“屯堡人”群体通婚圈中“屯对屯”、“堡对堡”、“民屯对民屯”、“商屯对商屯”的亲对亲、戚对戚的单向性婚姻模式,以及世家通婚的姻亲关系,即是所谓同一的“屯堡人”内部认同多元化的外文化表征。访谈中涉及的天龙村和大西桥镇石板房村互不通婚的例子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二二五,景泰附录。

清道光七年(1829年),刘祖宪纂修,安平县志·食货志·户口,卷四。

袁天沛. 贵州屯堡文化的历史和形成 [EB/OL]. <http://blog.sina.com.cn/m/tpyuan>.

正是这样:石板房的汉族在清代才迁入定居,屯堡人称这类后迁汉人为“客居汉人”。石板房素有“小荆州”、“安顺街”之称,其人员多从事商业,特别是食盐贸易,经济收入丰厚。一些商人将获取的利润转为土地资本,成为商人兼地主。而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天龙都是以农业为主,所以,石板房的人称天龙为“乡下”,称天龙的人叫“庄户人”;而天龙的人去石板房时,则称为“上安顺街”。相反,石板房的人去天龙时,称为“下屯头”或“下乡”。可见,由群体阶层地位和社会关系带来的社会边界转化为所谓“屯堡人”“内部”清晰的族群边界。

四、结果与讨论

从本族群口述历史和相关文字材料的比较可以看出,原始“屯堡人”的成分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而族群的认同方式也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

第一,“屯堡人”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汉族或者少数民族)成分的族群(ethnic group),而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民族族群成分的人群共同体;“屯堡人”仅仅是这个人群共同体在特殊情境中需要进行“整体性认同”时的一个标志和符号。在更多的情况下,在“屯堡”的社区活动中,具有“征南”类别的族源正统性认同更为普遍。

第二,“屯堡文化”以及“屯堡”族群是地域性的区域文化,其认同属于族群地域性认同层次。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屯堡人”是成整片的集中分布于现平坝、安顺、镇宁、普定、长顺等区域的,而此一整体区域正是“屯堡”移民社会的地理和社会空间范围所在。这样,与其说“屯堡文化”是所谓“屯堡人”的文化,倒不如说是地域移民社会的文化。

第三,当代意义上的“屯堡”概念是以“屯堡文化”为认定标准的“想象的共同体”,是由政府、学界、媒体和地方精英共同建构的“理想类型”。

这里,把从不同时空层面抽取出来的文化因子人为地整合为一个普同性的“屯堡文化”并以其界定“屯堡”族群时,显然过于强调文化的“客观性”,也过高估计了文化的规约力,使人成了文化的奴隶。

如上分析,不论以“屯堡”人员构成而言,抑或从族群认同而论,现在含义的“屯堡”和“屯堡人”只能算作实体性屯堡人一方面的构成因子。在贵州这片号称“屯堡”的地域共同体内,由不同移民带来的各种原文化因子长期相互碰撞涤荡,并与其周边民族族群文化关联互动,整合出新的具有“混合体”性质的区域移民文化。对于屯堡文化的混合性质,费孝通先生早在解放之初中央访问团赴贵州进行“民族识别”调查时即指出:被蔑称为“堡子”的人是早期军事移民的汉族,他们不可能回到故乡,于是就地娶少

数民族的女子为妻,经过长期间同化并与后来汉族移民融合而为现今所见到的汉族。^[11]这种具混合性的屯堡文化在当代背景下被挑选抽取其中些许文化因子,“再创造”为“纯粹”的六百年前大明王朝汉族江南文化遗存,从而具有“理想类型”色彩。

当然,笔者的这些文字并不是否认作为整体性的“屯堡文化”和“屯堡”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它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上把握该族群活动的时空大背景。但一味追求整体性并以其为建构“屯堡人”历史的唯一途径,显然不利于揭示屯堡人发生、发展、演变的族群群体性差异以及历史和现实社会上存在的多样化、多层次的群体组合的动力本质。而研究屯堡族群群体性的差异更生动地反映了族群活动的历史,为我们了解人群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资料。

[参 考 文 献]

- [1] 帅学剑. 安顺屯堡人与屯堡文化[J]. 安顺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4, (3).
- [2] 翁家烈. 屯堡文化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01, (4).
- [3] 翁家烈. 屯堡人调研报告[A]. 贵州民族调查(第13辑)[C]. 贵州省民族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1996.
- [4] 陈训明. 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J]. 贵州社会科学, 2002, (5).
- [5] 周耀明. 族群岛: 屯堡人的文化策略[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2, (2).
- [6] 沈福馨, 等. 安顺地戏论文集[C]. 北京: 文学艺术出版社, 1990.
- [7] 熊迅. “傲气”的解释与村落的仪式——一个屯堡村落中地戏的民族志考察[D].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5.
- [8] Barth, F.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 [9] 蒋立松. 贵州汉族的特殊群体——安顺地区屯堡人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调查[A]. 贵州民族调查(第13辑)[C]. 贵州省民族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1996.
- [10] (日) 塚田诚之. 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01, (1).
- [11] 费孝通. 兄弟民族在贵州[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1.

收稿日期 2008 - 12 - 20

[责任编辑 秦红增]

[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朱志燕(1979~), 女, 新疆石河子人,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06级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zhuzyan@gmail.com. 福建厦门, 邮编: 361005.